

曾
巩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



曾 巩

● 陶文鹏

选注

大连出版社

1998 · 大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郭预衡,侯光复主编, - 大连:大连出版社,1998.4

(月亮文库/康琳,侯光复主编)

ISBN 7-80612-467-5

I. 中… II. ①郭… ②侯…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古代
IV. I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8205 号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全 11 册)

郭预衡 侯光复 主编

大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三河市科教印刷厂印刷

字数:2700 千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23 插页 55

印数:0 001~8 000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许文彦

责任校对:刘青 宋丽

装帧设计:北京羽人创

陈正平 程萍

意设计中心

ISBN7-80612-467-5/I·70

登记号:(辽)第 15 号

定价:198.00 元(全 11 册)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

主 编	郭预衡	侯光复
常务副主编	康 琳	
责 任 编 辑	许文彦	
装 帧 设 计	羽 人	
插 图 绘 画	王国能	

《左 周》卷	张文湫	选注
《司马迁》卷	黄 涛	选注
《韩 愈》卷	洪祖斌	选注
	尹 江	
《柳宗元》卷	阿忠荣	选注
	张廷银	
《欧阳修》卷	萧 放	选注
《曾 巩》卷	陶文鹏	选注
《王安石》卷	齐石宜	选注
	李真瑜	选注
《苏 轼》卷	田南池	选注
《归有光》卷	赵伯陶	选注
《袁宏道》卷	李 鸣	选注
《集外卷》卷	韦凤娟	选注

前 言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散文创作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散文创作而闻名的大家不少。其中可称祖师者,有先秦的庄周、汉代的司马迁;可称大家者,有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和苏轼。唐宋以后,可同大家比肩者,有明代的归有光;可与大家抗衡者,有晚明的袁宏道。其作品或汪洋恣肆,或生动传神,或逻辑严密,或文采横溢,均具有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可以说,无论是阅读、欣赏还是收藏,这十位大家散文创作中的精品,都是当之无愧的艺术绝品,堪称“国宝”。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11卷11册,选编了这十位散文家的全部经典之作。其中,《集外卷》还汇集了自先秦至清末除此之外其他作家的散文精品。若以单卷论,本书收入了中国古典散文十大家一生中最重要作品;若从整体看,本书在时间上跨越了中国古典散文创作的全部历史时期,几乎囊括了代表各个时期散文艺术最高成就的佳作名篇。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一般文学爱好者,而非文学研究专家。因此,其选注体例多从有助于阅读与欣赏着眼,不特别强调学术创新。选注过程中,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一不标新立异,二不作繁复辨析,只取多数学人认可之说。

本书每卷均含“作者小传”、正文和附录三部分。“作者小传”扼要介绍散文家的生平活动和创作特色,使读者对作者的一生有个总体了解。正文中,每篇文章后一般都有“题解”和“注释”。前者主要介绍写作背景和作品主题。后者意在扫除阅读中的语言障碍。如果读完本书后,读者还想对该散文家作更全面的了解,“附录”中的作者“生平创作简表”和“散文版本简目”可以起到引领作用——读者据此可以找到该散文家的其他选本或文集,进一步研读。

本书入选的散文作品大多按作者创作的时间顺序排列,而且除庄周、司马迁和王安石以外,每个散文家的作品都按作者生平活动的阶段性或作品思想艺术的变化加以分期。这在其他选本中是不多见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一般读者更好地把握每一篇作品特定的思想内容。当然,作家们的艺术创作是自然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不能截然分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人的任何一种理论上的分期都会有其不完善的地方。这些地方有待于学术界从其他角度再去完善或弥补。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了学术界、出版界许多专家的指导与帮助,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管士光先生和北京出版社的李志强先生。没有诸位专家学者及同仁的热情相助,本书是不会这么顺利出版的。在此我们深表谢意。

曾巩的 生平与 散文创作

北宋中期著名的文学家曾巩，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今江西南丰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曾巩自称“家世为儒”（《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从小就受到家庭中儒学的熏陶，聪敏好学，读书过目成诵。十二岁能文，落笔惊人。十六、七岁时，已通读六经，立志成为优秀的古文家。年未二十，已名闻四方。景祐三年（1036），十八岁的曾巩赴京应举不第，却结识了来京游玩的王安石，二人志趣相投，成为挚友。庆历元年（1041），曾巩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受到欧阳修的赏识，从此文名渐盛。庆历二年曾巩再次落榜而归，欧阳修写《送曾巩秀才序》，激励他“广其学而坚其守”。

曾巩落榜归里后，家境十分窘迫。父亲曾易占因受诬罢官赋闲，使全家人几乎到了“无田以食，无屋以居”（曾肇《亡兄曾巩行状》）的地步。二十九岁时，父亲病歿，他奉养继母，“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宋史》本传）。尽管生活贫困艰难，曾巩仍发愤攻读，刻苦磨砺。在这期间，他向欧阳修推荐过王安石等人，多次上书欧阳修、蔡襄，表达对朝政国事的看法，为范仲淹发起的“庆历新政”的推行欢欣鼓舞，又为其夭折而痛心疾首。

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任主考官，大胆革除科举积弊，排抑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文风为之一变。曾巩与其弟曾牟、曾布等一门六人俱中进士。

曾巩进入仕途，初任太平州司法参军。嘉祐五年，召为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编校秘阁古籍。神宗熙宁初，改任英宗实录检讨官。在将近十年的馆阁生涯中，他对古籍整理做出了不少贡献。

熙宁二年（1069），曾巩出任越州通判，四年派知齐州，六年移守襄州，九年徙知洪州，十年移知福州，元丰元年（1078）改知明州，后又改知亳州、沧州。在这“转徙八州、推移一纪”（《再乞登对状》）的外任期间，曾巩颇有善政。如在越州组织救荒，在齐州惩办权豪恶霸和开办学校，在襄州开释无辜的囚徒，在洪州控制瘟疫的蔓延等。他对王安石

的新法有异议，但对其合理部分能认真执行、灵活掌握，推行农田水利、免役、青苗、保甲等法收到很大实效。

元丰三年，曾巩赴沧州途经京都，受到神宗召见和赏识，留京任三班院供事、史馆修撰，典五朝史事，后擢拜中书舍人。元丰五年，曾巩患病，又遭母丧，去职。次年卧病江宁。再次罢相而退居钟山的王安石常去探视他。这一对文坛挚友由于政见分歧而有过较长时间的隔膜，但在最后诀别时，彼此都获得了友情的安慰。

元丰六年四月，曾巩在江宁府病逝。南宋理宗时，追谥文定，故后人尊称为曾文定公。

曾巩的一生辛勤著述，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十卷行世。可惜后二种已散佚，今存《元丰类稿》五十卷，另有史学著作《隆平集》二十卷。

曾巩不以诗名家，他的诗却有一定成就。古体诗有节制地吸收了韩愈、欧阳修诗歌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努力追求诗意与哲理的结合，常借助抒情性的议论将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风格古朴凝重或平易疏畅。律绝诗特别是后期的写景抒情之作，例如《甘露寺多景楼》、《西楼》、《城南》等，写景细腻，色调明丽，意境淡雅秀洁，时有豪迈飞动的气势，在艺术上比较流利、纯熟。钱钟书在

《宋诗选注》中说：“就‘八家’而论，他的诗远比苏洵、苏辙父子的诗好，七言绝句更有王安石的风致。”这个评价是中肯、恰当的。

曾巩被后人推誉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的文学成就和影响，主要是在散文创作方面。今存曾巩文计七百七十一篇，有论说、记叙、书简、序跋、赠序、传记、奏议、诏册、碑志、祭吊、杂体等，可谓众体兼备，蔚为大观。

曾巩的散文，有明显的儒者特色。他相信“经者乃万世之法”（《黄河》），“于天地人事，无不备者”（《上欧阳舍人书》），因此自觉遵守孔孟之道，而不同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的融会百家，兼采佛老。他在文章中总是以六经为归依，大力宣扬儒道，对于违背儒家思想的学说，一概予以摒弃。例如，在《梁书目录序》、《分宁县云峰院记》、《菜园院佛殿记》、《鹅湖院佛殿记》、《兜率院记》、《说非异》等文中，曾巩出于对国计民生的迫切关心和对儒道日衰的深深忧虑，尖锐地指责佛门大肆挥霍国财民力修建佛殿，抨击佛教徒“利心无足，而假无欲也；行为险秽，而强高言淡泊也”，断言佛教是“中国之患”。他在《仙都观三门记》等文中也批评道教不合儒家礼制之谬。《筠州学记》认为“刑、名、兵家之术”皆“狙于暴诈”，言行不善。他虽然赞赏司马迁的《史记》“能叙事”，却又维护儒家正统思想，批评《史记》“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

颠倒而采摭谬乱”（《南齐书目录序》）。曾巩宣扬儒道殚精竭虑，不遗余力，而且自认“迂阔”而不悔。

然而，曾巩决非那种闭门穷经、食古不化的迂儒，也有别于宋初那些脱离现实单纯以儒学相号召的古文家。他主张守道治学应“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战国策目录序》），要“知天地事物之变，古今治乱之理”，以便“随所施为，无不可者”（《宜黄县学记》）。因此，他的文章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切实的现实内容。他于皇祐元年撰写的《本朝政要策》五十首，系统地考察了宋朝考课、训兵、边采、贡举、佛教、契丹、刑法、水利等五十个事项，涉及政治、军事、教育、宗教、外交、财政等各个方面，阐述了他对时政的见解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展示出广阔的政治视野。他支持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在《熙宁转对疏》中，称神宗“更制变俗”的决心是“比迹唐虞之志”，又在《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针对当时攻击新法的汹汹舆论，赞颂神宗即位以来“斟酌损益，革敝兴坏，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备，非因陋就寡、拘牵常见之世所能及也”。他也在文章中开诚布公地表明自己在改革的方法策略方面与王安石存在深刻分歧：在《与王介甫第二书》中主张“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后乃可以为治”，反对操之过急；在《熙宁转对疏》中提出行“大学之道”为“更制

变俗”之“正本”，反对以“征诛”求治。曾巩这些看法不无迂阔之处，但也确实清醒地认识到王安石变法计划的不够审慎和周密，不失为有一定价值的建议。更可贵的是，曾巩一贯坚持早期儒家“民惟邦本”、“民为贵”的思想，在文章中经常表达对民生疾苦的关切。在《救灾议》、《议仓》、《时俗辨》、《财用》、《上欧阳舍人书》等文章中，都充分地体现了曾巩的儒学入世精神和匡时济民、推利天下的政治理想，内容充实，绝少空谈，于事有补，于世有益。最典型的一例是《越州赵公救灾记》，曾巩出于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有意用史家笔法，详尽周匝地记述赵抃救灾的具体措施，使此文成为一份古代荒政史的珍贵而翔实的资料，可以推及天下，推及后世。

作为儒家正統的古文家，曾巩论文强调以道为本，文以载道，特别强调文章的经世致用，服务于社会教化。这种正統的文学观点，给他的散文创作造成了一些局限，同思想开放、勇于吸收老庄和佛禅思想与审美观念的欧阳修、苏轼相比较，就显得过于平正稳重、保守狭隘，未能自觉地追求文学的审美价值，追求真实自然的艺术情趣与境界，因而文字醇厚有余，文采相对不足。但曾巩毕竟不同于那些重道轻文乃至认为作文害道的理学家，他深知“文”在述“道”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强调“蓄道德而能文章”（《寄欧阳舍人书》），二者不可偏废。他自己其实也颇

“爱文”，在《与王向书》中三致其意：“爱其文”，“复爱其文”，“实可叹爱”。他对于那些虽不合道却极有伟辞的文学家也给予相当的肯定，如说李白：“白之诗连类引义，虽中于法度者寡，然其辞閎肆隽伟，殆骚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李白诗集后叙》）认为司马迁“亦不可不谓隽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南齐书目录序》）。此外，他还用“伟丽可喜”、“閎深隽美”、“雄壮俊伟”、“徜徉恣肆”等语评文，可见他对文辞的重视。因此，他才能创造出文质兼胜的优秀散文，在“唐宋八大家”中占一席位。

曾巩的散文，既是儒者之文，又是学者之文，有浓郁的书卷气和学术气息。他在《类要序》中赞赏晏殊学问广博，在《南轩记》中记载他自己收藏的作为“益友”的典籍，可谓包罗万象。广泛地、大量地阅读典籍，使曾巩学有根底，博古通今，具有较高的史学修养，写作时旁征博引，借古喻今，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创作出不少具有明显学者特色的文章。他的十几篇目录序，不仅对古籍的存佚、流传多所考索阐明，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而且往往借对古籍的考辨纵论古今，发挥儒学义理，或直接批评时政，提出新颖的见解。其他文章也表现出他喜好探赜索隐、考察源流、广征博引经传文字的学者特色。而《襄州遍学寺禅院碑跋尾》、《桂阳周府君碑并碑阴跋尾》、《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等文，又显示

了他兴趣广泛，喜爱文物，具有很高的书法和音乐艺术修养。

散文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说理、叙事、写景、抒情四个方面，曾巩文在这四个方面都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的造诣。曾巩长于说理，他的文章多为议论文。他在早期论述事理，常常落笔便入题，或劈面提出论点，然后用对比的方法展开议论；或开篇先树一对立面，再在正反相形中议论说理，如《国体辨》、《邪正辨》、《问尧》、《论习》等篇便是如此。还有些作品，诸如《说用》、《说官》等，借鉴吸取了先秦策士们常用的类比法与口吻言辞。总的来看，曾巩早期的议论文立论明确，气势旺盛，锋芒外露，咄咄逼人，议论轻捷警策，但结构较单调，缺少层次与波澜，说理也不够透辟。后期的议论文多取敛气蓄势、藏锋不露的笔法，善于立意，精选“文眼”，围绕中心步步深入，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用充足的论据，反复阐明道理。行文讲究章法结构、文气脉理以及开合顿挫。往往夹叙夹议，以叙出论，不迫不躁，纡徐委曲，使说理周密严谨，有层次，有起伏，有兴味，多能曲尽事理，透辟深微。例如，《战国策目录序》、《梁书目序》这两篇驳难之作，都采用欲擒故纵、先扬后抑的写法，在从容和缓中见精辟犀利。《赠黎安二生序》与《书魏郑公传》分别以“迂阔”和“其书存也”为文眼反复论证。《寄欧阳舍人书》则用“蓄道德而能文章”这一句组织

全文脉理。《与孙司封书》和《叙越州鉴湖图》都是夹叙夹议、叙议一路双笔兼行的佳作。

曾巩的散文亦长于叙事。他评论文章，常把是否善于叙事作为一个艺术标准。《王容季文集序》就集中地评论古今作家作品的叙事艺术。曾巩叙事，详略适宜，繁简合度，层次分明，不枝不蔓，细密而有条理。他善于用简短的文字清楚地叙述事情的始末梗概。例如《李白诗集后序》，仅用短短的三百字便叙述了李白一生曲折坎坷的经历，其概括性超过了李白的有关碑传文，还能指出过去史书中记载的错误，可谓简明扼要。而《越州赵公救灾记》记叙赵抃在越州救灾的准备、措施、作风、效果等，繁而不乱，细而不碎，条理清晰，堪称详尽周匝。

曾巩叙事又善于剪裁。如《先大夫集后序》中写祖父曾致尧的生平，着力叙其勇于谏争，不避权势的品格，其它则一笔带过。《抚州颜鲁公祠堂记》叙颜真卿的生平事迹，紧紧围绕着“捍贼”与“忤奸”两件大事落墨，更着重写“忤奸”，从而突出了颜真卿的刚直性格，文气也爽净。

曾巩叙事生动曲折，引人入胜，善于在叙事中表现出各种各样人物的行动、神情、心态、性格。例如《杂识二首之二》写狄青征侬智高事，先为狄青出场营造浓重气氛，再标出细目，然后一一叙写缴合，有顺叙，有补叙，有对比，有穿插，有人物对话，有戏剧性

场面，有丰富的细节，绘声绘色，清晰生动，成功地刻划了宋代名将狄青大公至正、奇谋卓识的形象。《秃秃记》仅五百多字，把官僚孙齐有妻再骗娶、生子再杀子、最后罪行暴露的经过叙述得非常曲折，扣人心弦，活现出孙齐卑鄙狡诈、凶恶残忍的性格，一个反面典型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这一类叙事作品，可以看出曾巩对司马迁、班固的人物传记的艺术经验的继承与借鉴。

曾巩文不多写景。今存杂记三十余篇，所记有轩堂、亭台、佛殿、学舍、救灾、浚渠等等，但多为议论说理。如在《墨池记》中，作者正面描述墨池仅寥寥几笔，却着重从王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引出深造学业、道德必赖后天学养的深刻议论。《醒心亭记》、《游山记》等，也几乎不写景物。曾巩并非不能写景，偶一为之，竟是笔精墨妙，状景如画。如《道山亭记》写闽中山川的险远，《拟岘台记》写抚州山野四时明晦之景，皆刻画精工，穷形尽相，毫发不谬，明显取法柳宗元的山水记而得其峻洁峭刻。《游双源》写道：“……引流而下，左右方沼。峻宇画阁，置于峰之麓。飞桥走阶，雕栏曲槛，帘隅翼翼，红绿相照。双源之会，澄心堂为砥以钓，相望之间，仰有翠阴，俯有清浅。风色动静，禽声语默。水涵太虚，形影上下。忘机之鳞，一游一濯。”多用四字句式，状景动静相生，形影兼得，声态并作，清丽灵秀，情景交融，臻于妙

境。看来，曾巩写景状物，既善工笔，又擅写意，密疏二体俱佳。

抒情之作在曾巩文集中数量较少，亦非其所擅长。但他所作的哀祭文和墓志铭中，也有诸如《祭欧阳少师文》、《祭宋龙图文》、《朝中祭钱纯老文》、《祭王平甫文》、《苏明允哀辞》、《王容季墓志铭》、《亡妻宜兴县君文柔墓志铭》、《二女墓志》等抒情佳作，或为韵语，或为散体，抒发出对师友亲属的真挚醇厚之情，颇为感人。其中，《二女墓志》不足三百字，哀悼他的两个夭折的女儿，以平凡而典型的生活细节，把女孩天真可爱的形象写得呼之欲出，更把自己由于穷困与奔忙而未能使孩子得以成长的内疚之情，写得有如血泪交迸于纸上，读来令人凄然。曾巩的书札多是开陈政见，纵谈古今，评议学术，但《答范资政书》、《寄欧阳舍人书》等篇，将铭感之情以议论出之，言理入微，用情亦深，正如茅坤所评：“纡徐百折，而感慨呜咽之气，博大幽深之识，溢于言外。”（《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三）又如《福州上执政书》，是为请求辞免福州太守任移官内地，以便就近养母而作。文中连引风雅，且叹且释，将自己的一腔忠孝、满腹愁结尽情倾吐，较之李密《陈情表》的直抒更为庄重典雅，也更加哀婉动人。张伯行说此文“用笔如鸾鹤之盘旋于霄汉，将集复翔，到末一收，神情完足。”（同上）

曾巩的记叙文与说理文有的插入抒情